李桂华《种·梦》

新时代呼唤有思想力的写作

□李一鸣

问题，是长篇报告文学《种·梦》的灵魂。

报告文学素有“文学轻骑兵”的定位，与其他体裁相比，它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是不是密切关注现实，能不能主动介入现实，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敏锐发现问题，深刻揭示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报告文学作家水平高下的分野。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品的分量，来自报告文学作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投向关系国家、民族、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并以雄健笔力为之提供“试摹的社会的画稿”。报告文学文体形成初期的许多名家名作莫不如是。瞿秋白创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的就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夏衍的《包身工》，叙写上海等地包身工的种种遭遇，意在揭露和铲除产生“包身工”非人制度的社会土壤。西方报告文学作家也不乏问题性书写。《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而且深入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其以西方视角对中国当时社会生活处女地的开垦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预见，使之成为报告文学史上的名篇。新时期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的洪流，报告文学浪潮汹涌，蔚为壮观。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强烈社会参与意识和宽广视野，瞄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重大问题，创作出一大批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有的甚至直接推动了社会进步。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等等，领时代风骚，成就一时繁华。

报告文学作家李桂华接续“问题报告”的精神血脉，直面社会重大问题书写，锐笔开掘“种子问题”这个“事关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世纪命题”。一部新中国的民族种业历程，就是一部艰难发展、不断探索的历史。从“就地选种、就地推广”，“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的小农生产，到“依靠群众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的育种模式，从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建立到实施“种子工程”，向育、产、销一体化乃至向市场化、国际化转变，种子始终联结着吾国吾民的生活。特别是随着市场开放、外资进入，生机勃勃的种子市场，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战场，民族种业陷入“大产业、小种子”的尴尬境地。面对这个事关国运存亡的大问题，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对现实世界的刚性介入展开时代叙事，产生了较强震撼力。

塞尔维亚著名报告文学作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一文中谈到：“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小说有它自己的主要线索，它的主角们的生活。而报告文学的主要线索就是主题本身。” T.巴克一语道破报告文学重要的文体特征，即报告文学的主体性和思想性。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也说：“什么是思想？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作家如果停止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质疑与发问，便停止了思想，也等于停止了生命。” 事实上，报告文学作品之能提出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根本取决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力。而思想力的强弱，又突出表现在对重大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中的“优”与“劣”是否具有清醒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具有“破”与“立”亦即“批判”与“建构”的自觉担当。

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无不熔铸着报告文学作家“批判”与“建构”同在的进取精神，倾注着他们对革除旧制、开辟新境的理性思考。“批判”本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道义，“建构”则是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批判”与“建构”是辩证的统一，“批判”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批判”基础上的拔升，没有基于理想愿景指引下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清醒否定，就没有改变，没有未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体现出的是“批判”和“建构”民族国家的双重心理特征，涵蕴深沉的思考力量；范长江的《万里关山》、肖华的《前线一日》等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以纪实笔法揭露战时黑暗，歌颂解放区生活，“批判”与“建构”的理念贯穿其间；刘白羽的《漂河口杂记》，孙犁的《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等解放区报告文学作品，则以“黑暗”和“光明”作为两轴，表达了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摒弃，对理想中的新社会到来的喜悦。新时期以来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也体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和建构性品质。何建明《共和国告急》，鞭挞乱采滥挖矿山造成矿难频发、生命丧失的乱相；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将笔锋指向毁林事件愈演愈烈的背后领导干部带头违法的事实；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深刻揭露了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触及社会痛点的同时，报告文学作家也以前瞻性视野，或直或曲、或隐或显建构起理想社会理想状态的美景，给读者以深切的感染和思考。事实证明，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是重大事件的“在场者”“记录者”，能够深入社会生活现场，细腻刻画描绘客观存在，而且作为社会问题的“思考着”“行动者”，他们总是以独立、高远、深刻的思想照亮现实、指向未来。

在长篇报告文学《种·梦》中，作者以崇尚真理、揭露问题、寻求梦想的精神，敢于批判，不回避矛盾，秉笔直书种子业存在的问题，揭开民族种业“小散乱”，育繁销脱节的“致命伤”；大胆披露某些龙头企业与国家政策反向而行、背道而驰，甚至套取国家扶持资金，造成国家资源浪费的事实；揭穿某些企业因一己私利，打压同行，巧取豪夺行业利润，致使民族种业陷入纷争，从业人员人心惶惶的行径；揭露某些国际种企从新品种研发、繁育到生产、销售等方面掌控中国种业命脉的野心；深入揭示了国内种业投入能力不足，研发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明确指明民族种业面对全球开放，坚持内生发展，依靠法律保障，改革科技体制，提高创新力、竞争力的方向。尤为可贵的是，面对有人要对作者报复的扬言，作者直抒胸臆：“一个关乎民族情感、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一个发展阶段中的、不得不令人关注的话题，一个我们的国家正在大力扶持、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完善的大战略，一个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生存繁衍为继的生活资料——种子，难道因为我去关注、去书写、去揭示，就会受到报复吗？我触动了谁的利益？我违背了谁的原则？这根红线，因谁而划？因谁而无法触动？”她坚信，“我的书写是与国家政策相向而行的，是与所有遵纪守法的种子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高度一致的，是与国人的所思所想所盼出于同一个声音的。”其情其志其言其行，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良知和品性。

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保持兴旺发展势头，涌现出一大批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历史感、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思想性缺失、问题意识淡化、批判锋芒弱化也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痼疾。有的迷失在“世俗化”浪潮中，以 “歌颂之名”、“正能量”说辞，作谄媚之态、行“广告”之实；有的跌落在“市场化”泥淖中，成为金钱的奴隶，靠报告致富，以文章发财，丧失了一个作家的尊严。有的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漠然视之，只会假定现实、粉饰生活，不敢揭露矛盾，干预生活，使创作失去了立场，文学失去了重量。还有的以偏概全，偏离真实，甚或抱着个人一己之私，胡编乱造，抹黑现实，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种·梦》作者守望理想，坚守崇高，排斥流俗，深怀忧患意识，秉持批判风骨的写作，就更值得提倡、更有意义。

当前，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生产力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这都会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必然与生活相随，同矛盾相遇。报告文学作家只有贴近现实，贴紧人心，善于理性观察社会，清醒发现矛盾，如实描绘正在发生的人间故事，以前瞻视野破除制约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问题，才能创造新时代报告文学新的价值。

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叙事

——王昕朋小说及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论略

□曾 攀

王昕朋是一位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他的作品向来关注生态文明，2013年的中篇小说《消失的绿洲》，写的是黄河故道生态文明，即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前后的历史时段中改造生态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曲折绵延。2014年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写的是脱贫攻坚中新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思路的冲突，但主要故事情节围绕的还是保护绿水青山展开。除此之外，小说《黄河岸边是家乡》《寸土寸金》《村长秘书》等，以及散文集《冰雪之旅》《会唱歌的沙漠》中的诸多篇幅均与生态有关。纵观王昕朋作品的生态叙事，从现实博弈、人性反思、价值审判等多个层面，回应了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伦理与国家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生态叙事及其生发的美学形态，并不只是为了概念与理念化的“生态”，而更多指向文学的话语机制与主体伦理，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之间，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相互参照，甚至与人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彼此协商，表达的是多元精神文化形态博弈中的生态发展。

《寸土寸金》主要围绕北州市大龙湖的历史与现状、保护与开发展开叙事，将众多人物牵扯进生态叙事的框架之中，呈现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与矛盾。大龙湖从一个历经磨难的小水库变成全国二线城市的城中湖，从而变得“寸土寸金”，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觊觎和争夺的所在。而最终如何开发和保护、利用大龙湖，成为了整个小说叙事的中心。可以说，小说在一种政治、经济与人心的博弈中展开关乎生态的叙述，生态是一种关系中的生态，以此形成复杂多元的争夺场域，从而将生态叙事推向深远。

《黄河岸边是家乡》讲述了黄河岸边的河套村中，李大河与李长河两代人针对是否应该开展黄河挖沙互不相让，直至上升到伦理与法治的范畴。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真正将“生态”超越李大河、英子等人简单的生态保护，同时也超越保护与开发的二重对立的，是河套村现任村支书李长河的存在及其思考。在后者那里，河套村更应当关切的是村民的生计和发展，生态是现实中的生态，是多元决定意义上的生态，他主张挖沙，然而也意味着会破坏黄河生态。小说最后，河套村村民的苹果生意得以通过网络推销的方式解决，李大河与李长河也握手言和，黄河生态得到保存。在文本中，生态的保护与现实的困境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生态不是一个超保护状态的概念，也不是高悬虚空的理念，其是在不同的结构形态中生成自身的价值观念，更重要的，“生态”的意义还绵延至事功层面，也就是说，再好的理念，也应该是创新中的协调发展，沉落于切实的人文与生活现场。其固然可以不是人本主义的，但却与人文主义相对应。因而需要在新发展理念下形成对“生态”的重新认知，这也是具备当代性意义的“生态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篇小说《冤家路宽》写的是一河之隔、同样种植银杏树的两个村，因为争“银杏王”而产生矛盾，成了“冤家”，但正是为了保护银杏产业和当地生态，最后成了“亲家”。

相较而言，《消失的绿洲》不是大团圆结局，其中的“生态叙事”贯穿着地域文化、生活情感甚至是主体意志。具体而言，作为生态标本的黄河故道园林场，“是徐州解放后的第二年创建的，十几个人捣腾了一年，平了几十座沙丘，树苗也栽了，可风沙一来，掩埋的掩埋，连根拔的连根拔，一棵也没成活。县里一位领导发了话，那茅草都不长的地方能种树？别朝沙坑里扔钱了，撤！”然后在解场长的个人意志与发展理念下，在一片贫瘠的园林场中创造出了“十里白杨大道、万亩苹果园、千亩苗圃”，一举扭转了当地“生态”，但最后却在商品经济时代面临新的困境。叙事者在历史的纵深处，讲述对自然生态的坚守以及在守护中的动摇和变迭，潘广播和汪光明创造了黄河故道园艺场的生态辉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潘广播心境和观念发生了转变，园艺场最终被改造为高尔夫球场，但是这其中始终伴随着各方的牵念，潘广播集黄河故道生态的创造/破坏者于一体，并于深刻的反思中收束。小说对“生态”的生成及更迭，进行了历史的观察，言及操持的变与不变，也揭示人性的转圜。“消失的绿洲”不仅指的是黄河故道的园艺场在以高尔夫球场为表征的商品经济中的沦陷，更意味着灵魂净土的蒙尘。小说以生态映衬“叙事”，由是直指历史，批判人心，更触及到了当下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和协调发展的现实反思。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历史延伸与自然和谐之间，是否可以实现新与旧、传统与当下的有机协调，这是生态叙事的困境，也是新发展理念下新的命题。

此外，王昕朋还善于在历史的维度中，显示制度化与系统性治理下的生态现况，如《会唱歌的沙漠》中，传说中宁夏鸣沙山地区风沙来袭时“万马奔腾，或者说洪峰澎湃的声音”，因为沙头坡的治沙工作造就了大片绿洲而偃旗息鼓，“不仅保护了阿拉善沙漠地区的土地，改善了这里的环境，创造出了独特的沙漠生态系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它阻止了沙漠化的进程，有效地保护了黄河不被沙漠侵吞，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治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在新发展理念下，催生了历史的人文的绿色生态，其中彰显了生态治理的制度化创新。散文《走出国门的男人》，描写了一群大兴安岭的汉子，为了保护大兴安岭林区生态，摒弃靠山吃山的传统意识，背井离乡，走出国门去搞开采。“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取得显著进步。”可以说，针对生态制度建设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王昕朋小说形成了特有的话语机制与美学认同；更重要的，新发展理念内化成了人物主体的言行选择与价值判断。这就不难理解小说《寸土寸金》的内在逻辑，也即人的贪欲和荒诞再膨胀，背后总有一种力量将其拉回来，还原，重塑，形成政治的与法制的、美学的与伦理的叙事结构。也得以了解《黄河岸边是家乡》中父子两代人最后毫无扞格的和解，《消失的绿洲》中潘广播在出让黄河园林场之后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懊悔反思，《花开岁月》中即便历史变革也始终不忘秉持的绿色发展与生态观念。

不得不说，“生态”是一个繁复多元的存在，其与政治经济、科技人文、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之间构成螺旋式的发展，同时彼此融合或制约。“新发展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构成了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当代中国的生态叙事，是生态，更是叙事，需要在小说话语思维与美学框架中呈现生态的现状与可能，而不是相反。因而，叙事文学中的叙事话语、结构美学、文化伦理，对于“生态”的表述是至关重要的。生态叙事的中心可以是自然和环境，但终点和宗旨却未必以“生态”收束，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心、人性与人文，生态美学与精神伦理是一体两面的，生态既是自然层面的生态，也是精神与主体的生态，以此形塑更为多重的意义和更为复杂的维度。而且，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叙事，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先入为主的单一主题，并非必然占主导性的绝对主旨，生态与其他主题是并存的，其可以是次要的但却是必要的，甚至成为其他主题的辅助而不丧失自身的独立意义，又或者生态理念仅仅是背景式存在与伦理性倾向，关键在于意义的协调与发展的创新。惟其如是，才能真正将生态叙事推向多元和多样，真正含纳新发展理念中不同层次的丰富性，并由此创造更多新的可能。

可以说，以徐刚为代表的实证式的报告文学，以阿来为代表的传统与当代历史参照下的自然境况及人心守持，以及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充满人间味和烟火气的土地情结等，代表了当代中国生态书写的多重镜像。王昕朋则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生态境遇，在历史流动与人心流变中揉入自然的处境，述写不同层次的精神褶皱，形成了当代中国生态叙事谱系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保林的《大江魂》、哲夫的《水土中国》等，提示着当代中国的生态叙事在关系形态与多元维度中所得到的深化发展，这其中所凸显出来的新发展理念，寄寓于技术创新、观念创生以至文体创造之中，强调生态与美学、自然与叙事之间的融合协调，其内在秉持的“绿色”理念，以及在开放中共享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精神及精神旨归，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文化与文学之维，同时创造出了当代中国文学新的话语生态。

李国彬《爱恨江城》

猝不及防之中的永恒所在

□北 乔

李国彬的《爱恨江城》（《广州文艺》2020年4期）以文学的方式直面新冠肺炎疫情现场，体现了中短篇小说与当下现实迅捷对话的优势。个人情感与社会道德、生命抗争与灵魂救赎、痛感与温暖共存于同一文本之中。《爱恨江城》有着关于生死、爱恨宏大叙事的野心，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切都很美好，生活里充满热烈的阳光和温存的月光，这是叙事的起点，也是江彦彦此前实实在在的人生感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慢慢引发了混乱。有些是早就存在的，比如江彦彦的男友肖义与她的闺蜜兔子之间的恋情，有些是因疫情而呈现的贪婪，比如肖义发灾难财等。

江彦彦是一位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物。因为从医院已经辞职，所以当原单位王主任让她填写全市医务人员登记表时，她果断地在微信里拉黑了王主任。为了爱情，她不顾生死去疫情重灾区的江城寻找肖义。万念俱灰之后，反而体会到人间的温暖。也正因为如此，她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到第一线战斗。这个时候，大爱从心底泛出，即便是遇到了感染为重症的肖义时，她也没有了恨，只有作为护士的本能和作为人的慈悲。江彦彦在自我拯救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从柔弱到坚强的蜕变，医护人员在生命线上的拼搏与伟大。而肖义在即将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时的那番言语，是完成救赎之后的灵魂之音。我们无法得知江彦彦与肖义今后会不会重新收获美好的爱情，但肖义的醒悟，具有很大的隐喻意义。走过灾难，我们应当丢下阴影，但最好还是将灾难作为某种警示与我们的生活长久相伴。

在《爱恨江城》中，生活既是即时性的，又具纵深感。作者李国彬对此拿捏有度，江彦彦、肖义、兔子等人在疫情之前的生活，除了应有的交代，更多的是对人物的立体塑造，并由此展现了他们遭受的种种或隐或显的危机。疫情起到了显影的作用。灵魂里的病毒，带着欲望在这个时候也汹涌而出。灵与肉、生与死，全方位参与现实的生活，并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以此出发，个人的生活开始介入历史；几个人物的生活，代表了现实中的很多人。

中篇小说的容量有限，而李国彬显示出较为高超的叙述策略，书写了疫情面前的江城人，既视野开阔又直观细腻。前半部分江彦彦寻找肖义，一路上江彦彦与出租司机、社区工作人员、交警、小店老板等众多人有了接触，整个江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全民抗“疫”的场景，得以铺陈。与此同时，还通过新闻、微信等方式，更宏观地陈述江城交通管制后的状况。这样的处理自然而真实，让作品更为丰厚。

李国彬的书写，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真实。“这个护士是蚌埠的，叫魏小妹，对王主任为她增加力量并不领情，待检验科只剩下了她和江彦彦两人，她问，谁让你来顶死的？”在这之后不久，“她把江彦彦带到一道帘子后面，开始帮江彦彦穿隔离服，戴口罩和眼罩。待做完了这些，她又找来一卷透明胶，将江彦彦的两只脚‘刺啦刺啦’地裹了起来。一边裹一边说，这种隔离服不问脚上的事，脚踝是透风的，前天检验科的三个护士就是因为脚上感染，被隔离了。”而那个王主任，在江彦彦的心中，是一个冰冷的老女人，喜欢挑刺，毒舌，极少夸奖别人。“王主任把门轻轻地关上了，然后从柜子的深处拿出两套隔离服来。江彦彦正在疑惑，王主任说，我省下来的，送给你。明天，你可以奖励一下自己，当中放放风，再换一套。”这样的细节是在写人，写得很成功，人物一下子立了起来。这样的细节，又是以更智慧的方式在写疫情的严重和医护人员的奉献。

《爱恨江城》写疫情、写灾难，更在写人，写细部的生活，真诚所带来的情感真实和心灵震撼，极其绵长强劲。李国彬以其优秀的文学创作功力和恰如其分的文学伦理，书写了疫情之下的个体和大众，新冠病毒和灵魂病毒双重纠缠下的生活与情感。这是关于表层的观察，又是关于生命内在的探测；这是关于抗疫的故事，又是关于救赎与奉献的人生片段。这样的书写，因为诸多的真实细节，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录。

艾云《那曾见的鲜活眉眼与骨肉》

历史的肉身

□杨汤琛

每次见到艾云，总会迷惑于她与年龄相分离的勃勃生机的美，她是那类可以逃脱岁月惩罚的女子，岁月于她而言，是美的加持而绝不是损毁，一种从失去的时光中生长出来的力量让她熠熠闪光，果然文如其人，她的文字也是这样有力而丰饶，散发了感性的蛊惑，又保持了宏阔的历史关怀与不懈的思想活力。

如果说艾云的《寻找失踪者》以女性敏感的触角深入西方诸类哲学命题，与福柯、萨特等哲学大师展开了激情而感性的思想辩论，那么，这本文集《那曾见的鲜活眉眼与骨肉》则在承续思想难度的同时发生了一个轻微的转向，她折向了幽深的历史，朝向了与哲学同样玄幻的过去，晚清的黄金版图、民国的情爱轶事、不同际遇的漂泊者、离乱年代的故人，它们曾尘封于时光内部，蜕变为岁月的遗迹，艾云要重新唤醒它们、充盈它们，于是，这些空洞的历史有了生命的光泽、绽放开了鲜活的眉眼。阅读这些文字，我总不自觉会僭用一个词“道成肉身”，形而上的思想、随风飘逝的历史，它们缥缈而高蹈，该如何加以言说？如何让漂泊的思想落地着花？如何让尘封的历史再度发光？引经据典的历史阐释、步步为营的逻辑图解不过是对阅读趣味的败坏，让人望而却步，而艾云宛如神奇的魔法师，她有能力用感性的触觉点化思想的灵光，有力量再度复活历史多汁的肉身，使之成为我们可观可叹的血肉丰盈的存在体。

历史与虚构有着古老的敌意，但真正引人入胜处也在历史与虚构的博弈之间，卡尔·波普尔曾说：“总之，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对解释的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艾云的历史言说也可谓她面临历史的一种自我解释，她在历史的终结处以虚构的方式回溯其全部复杂性，开始历史与虚构的相互辩驳、纠缠。艾云的历史散文几近于虚构性小说，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淋漓饱满的情感，有意味的是，在类似现代性小说朝内的、虚构性书写中，艾云又会冷静地将史料牵扯入内，作为真实的佐证抑或另一种的声音的辩论。《乱世离歌》以陈西滢的声音面具讲述历史人物的隐秘心绪之际，艾云会突然冷静地借助史料来探究他与鲁迅的关系，论及其为人处世，从而将宛然小说的虚构编织拉至散文的轨道。《那曾见的鲜活眉眼与骨肉》以勾连的方式记录了艾云对于历史风尘里不同漂泊者的想象，她想象虎跳峡壮士的犹疑与激情、想象河流边花婆炽热的情爱、想象草原男人的豪情与雄心，那些惟妙惟肖的人物神态、细致入微的情绪波澜俨然精心织就的小说，仿佛在故意扰乱小说与散文的秩序，但虚构终究是面对历史的一种修辞，艾云的卒章显志表明，有意图的虚构叙事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启发历史，探讨历史的可能性存在。

艾云的历史书写始终贯穿了她对于“个体”与“历史”的辩证性思考，历史作为总体性存在由无数个体所构成，与此同时，不确定的历史力量又挟持着个体生命朝向莫测的命运。《黄金版图》由历史而及现实，由边境争端而至国族主权，文章于纵横捭阖的历史风尘中展开了对于政治、人性、国权的深度思考，其中，艾云以并置的方式讲述了国族英雄李金镛与无名的采金工人招远汉子之间的命运纠葛，李金镛以个体生命投入国族命运、民族版图的事业，缔造了晚清辉煌的黄金版图，被历史所铭记而凸显为民族英雄；与之相对，采金的招远汉子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他的无名隐喻了无数埋骨他乡的苍苍生民，作为即将迅速被历史所遗忘的微尘，招远汉子并没有被动臣服于历史的洪流，而是在与历史相摩擦间爆发出了强悍的生命力。艾云将小民叙事与朝廷大员的历史命运相交织，立体呈现了晚清历史风云下的人的命运，一段历史尘埃落定，功勋卓著的李金镛被镀金身，成了历史的偶像，而无数匿名的采金人则用生命铸就了黄金版图的历史底色，纪念馆里无声的采金工具铭记了他们生命的体温，有名也罢、无名也罢，他们都逃不过莫测的历史暴力，以命运共同体的形态化为历史的坚实河道。

艾云的历史散文是好看的，足以蛊惑阅读者持续前行，因为，她始终以肉身的方式进入历史，或者说她赋予了历史以活色生香的肉身。追随她的踪迹，仿佛步入葳蕤茂盛的热带雨林，其间缠绕着艾云略微神经质的语言，这是因生命力旺盛、想象力充沛而膨胀的语言，你会不自觉地被她枝蔓丰饶的文字带入历史人心的幽微处，就如她自己所说：“我原本想写的就不是人类整体性那历史概念的恢弘主题，而是想触及个人的时间。这可持续性的和不可持续的时间里，那些眼眉，那些骨肉，多么地鲜活、生动。”《乱世中的离歌》一直在追问错综的爱与谅解是如何生成的？考古式的追溯、哲性的思辨，均源于历史轶事的可能存在，然而，这追根究底的过程却是处处芳草、遍地离歌，有着丰盈的形态，它的书写方式类似一部微型的《喧哗与骚动》，被情所羁绊的男女众生喧哗，从不同视角连绵展开了内心的哀怨喜乐，作者以带有体温的方式蠡测男女之情、剖析世道人心。

这就是艾云式书写，她从来不会对一个命题、一则历史平铺直叙，她总以自我植入的方式进入历史内部，嵌入到人物内在的生命性之中，用他我不分的眼睛观看、感受、追问，亦真亦幻地展现历史的血肉与经络。《那曾见的鲜活眉眼与骨肉》是有了肉身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艾云的历史，历史云烟深处翔舞着艾云的精魂。